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的特点及其现实意义

吕 林^{1,2},黄明理¹

(1.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 210098; 2. 泰州学院,江苏泰州 225300)

摘 要: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具有人民性、崇高性、科学性、实践性、时代性以及民族性等鲜明特征。这些特征既是共产党人所共有的精神特点,又因中国社会主义进程而呈现出独特的内涵,是共性与个性、理想与现实的辩证统一,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又显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理解。这些精神特征对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在推动党的理论和实践工作的创新、推进党的执政水平的提升以及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精神引领和激励作用。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D26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4)02-0009-05

精神追求如今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生活中的热词,这既与党内存在着的“四风”问题密切相关,也与我国社会发展新的历史阶段相关。在当下强调坚定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既充分体现了党自我完善和积极把握时代精神的理论自觉,也体现了党强烈的自我净化的愿望和能力。精神追求是人的独有属性,它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从总体上看,人的精神追求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呈现出发展的态势,但在具体的历史时期,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不同的个体或不同的阶级群体的精神追求呈现出不同的性质和特点,而不同性质的精神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反过来制约主体的命运走向。按理说,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这一问题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已解决^[1],但时代条件变化了,这个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又以新的形式呈现出来。因此有必要结合时代条件来探讨当下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的特点与意义这些根本性的问题。

一、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的内涵诠释

人的精神追求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主体在生活实践中所产生的精神需要;二是人对这种精神需要的积极追求。就精神追求的第一层面来看,

人在生活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精神需要是与主体对生活环境的认知和理解的程度密切相关的。由于生活实践的复杂化、多样化,以及不同主体对外部环境的理解和认知的程度不同,其精神追求必然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一般而言,反映时代特色的精神追求是人们对经过长期的理性思考及实践所形成的思想观念、精神向往、理想追求和哲学信仰的抽象概括^[2]。就精神追求的第二层面来看,人的精神追求是与精神主体的意志品格、精神操守等因素密切相关的。意志顽强、品格坚定、操守严谨的精神主体其精神追求的品质自然会更好,实现程度也会更高。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有着坚定信念的政党,其所具有的崇高的思想理念、坚定的政治立场、顽强的意志品格等因素,决定了其精神追求的崇高性和伟大性。这既体现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所共有的精神品格中,也体现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一伟大的实践过程中。

从理论属性来看,精神追求在本质上属于文化的深层次内容,一个政党的精神追求是政党文化的深层次要义的集中表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人的精神追求既与深层的理想相关,又与思维方式、情感方式、行为方式等现实因素相关,精神追求受现实因素影响,又对现实产生能动的改造作用。中国共产

收稿日期:2014-01-03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13WY00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2011B13314)

作者简介:吕林(1971—),男,江苏泰州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党人精神追求的核心在于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这种信仰与拯救本民族于水火之中,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建立富强、民主的新中国这些现实实践要素天然地结合在一起,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呈现出了独特的文化形态、丰富的实践内涵和独有的品格特征,它是集政治性、民族性以及时代性于一身的文化载体,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文化的核心本质,也彰显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层次内涵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代精神的独特理解。

因此,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是在共产主义的信仰追求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追求中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品格特征和精神力量。精神追求的最高层次是信仰,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能勇敢地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赢得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又一个胜利。正是由于这一信仰的激励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极为重要的精神财富,如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大庆精神等,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既是对其信仰的最好诠释,也是对其信仰的升华和发展,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的坚守和执着。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理想信仰视为高于天的精神之“钙”,视为其他一切品质的命脉和灵魂支撑,视为党执政的精神基础。坚定的理想信仰、崇高的精神追求始终是党战胜各种困难并走向胜利的法宝和秘诀。如今,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已经将这一法宝上升为了规律,这体现了党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坚定的理论自信。唯有精神上不“缺钙”,才能确保政治上不变质、经济上不贪婪、道德上不堕落、生活上不腐化,这就是说,崇高的精神追求是共产党人始终站稳政治立场、抵御各种诱惑和克服“四大危险”的决定性因素。

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的主要特点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有着坚定信念的政党,其精神追求既体现了共产主义者共有的精神特征,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独特内涵。大体而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的主要特点表现为:

1. 立场鲜明的人民性
-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一切从人民

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它的唯一宗旨。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以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从它的诞生之日起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由其自身的阶级性所决定的。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产生剥削的根源,解放全人类。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就决定了我们党在精神追求上必然具有立场鲜明的人民性。

2. 与时俱进的时代性
- “时代以其自身的矛盾迫使人们注意,并规定人们的认识所能达到的范围和界限,但它不能自发地产生任何理论。理论是精神生产,它有自己的特殊规律,其中一条规律就是,任何理论思维必须以它的先驱者提供的思想资料为前提,要批判地吸收。”^[3]中国革命先驱者正是在纷繁复杂的历史境遇中,因为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苦难的深切关怀和同情,而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精神信仰。从此,马克思主义就成了中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撑。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下,前赴后继,完成了民族独立、国家解放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宏伟局面,使得社会主义优越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也使得党和人民拥有了前所未有自尊和自信。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是紧紧围绕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展开的。此时,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的主要特征就表现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勇往直前、敢于斗争、反对教条主义、坚持实事求是,以及尊重和依靠群众、强调集体主义等。

在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通过继承、发扬了传统精神的精华,吸收、融会了时代精神,积极进取,与时俱进,并进一步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从而提升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解放思想、求真务实、改革创新、积极进取、包容开放等。

当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中国融入世界的程度不断加深,我们党所面临的世情与国情也变得更加复杂。近些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由世界的边缘逐步走向世界的中心,这时一贯奉行“因霸而强”、“强国必霸”逻辑的西方霸权主义国家便把我国的发展壮大视为对其价值观和根本制

度的挑战与威胁,进而不遗余力地加强对我国的文化渗透和精神腐蚀。目前,西方霸权国家总是不遗余力地推进意识形态外交,他们把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美化为具有普世性的价值,“推进全球化意识形态”^[4]。在国内,随着主体利益的日益多元化、矛盾化,其所带来的价值观的多样与冲突,兼之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使我们党和群众的精神世界面临严峻的考验。面对日益复杂的时代背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推进就更需要有崇高精神的支持和激励。伟大的事业产生崇高的精神,而崇高的精神也必将支持和推动伟大的事业。因此,现阶段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又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继续弘扬改革创新精神、艰苦奋斗精神、积极进取精神以及包容开放精神,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科学、民主、法制以及社会和谐等。

3. 特征鲜明的民族性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精神分不开,也与中华民族精神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所接受的内在因素来看,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是中国共产党人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推动力。因此,从自身的实际出发,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实际问题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5]而这就养成了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而不是简单地从文本上来理解和接受马克思的思维方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思想作风。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看,无论是在革命还是在建设年代,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没有脱离中国的作风气派,而是深深地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现实结合在了一起。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在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关心社稷以及追求自身人格的完善是最为核心的精神内涵^[6]。这些精神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以无形的力量、潜移默化地积淀在中国人的心理和性格之中。作为中华民族优秀儿女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其精神追求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民族精神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些优秀的民族精神使得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显得卓越而高远,坚定而执着。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品格与中华民族精神品格相结合的过程。故而,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

产。”^[7]正是这种结合使得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显现出了其独有的精神特点,即国际主义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完美结合。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追求所显现出来的卓越品格和与时俱进的精神理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弥补了我们民族文化中的缺陷与不足,从而使得我们的民族精神得以革新和重塑。这些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所强调的开放的心态、兼收并蓄的胸怀,以及弘扬法制精神、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奉献精神,注重权利意识、效率意识、公益意识等,逐渐为中国人所接纳,这就使中华民族精神在继承与借鉴中获得了新的发展。

4. 科学严谨的真理性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有别于前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她是以科学性作为其重要依据的,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对中国社会的革命性改造。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其坚定的信仰,而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最为基本的理论特征之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主要表现为,它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社会学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科学发展为依据,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社会而寻找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进而勾画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美好未来。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不仅仅表现在理论上,而且还表现在实践上。强调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和服务确保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品质,而且这一科学性是得到实践检验并予以确认的。自诞生以来,马克思主义已成功指导了无产阶级实现对人类历史的革命性改造。历史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了以实践为基础、以人民群众的解放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与历史发展趋势相一致的精神品质,而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和历史的创造者,这就确保了马克思主义和由它所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能够避免其他政党的阶级偏私性和由阶级偏私性所决定的非科学性甚至是反科学性。

总之,作为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结晶,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性(以实践为基础)和价值合理性(以人民利益为根本价值尺度)的辩证统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8.19”讲话中深刻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人类社会进步指明了正确方向。因此,尽管世界形势风云变幻,出现许多闻所未闻的新情况,远不是马克思当年所能具体预见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仍然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故而,

马克思主义依然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变的信仰和追求。”^[8]

5. 追求信仰的崇高性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的崇高性主要表现在其精神追求所具有的深度和广度上。从理论上看,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的崇高性主要表现为它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和追求,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种人类至高理想作为自己的最终奋斗目标。从实践上看,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的崇高性主要表现为它以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为起点,始终奋斗在争取解放全人类的革命道路上。“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9]为此,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冲破种种艰难险阻,最终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任务,但与此同时,对世界上其他灾难深重的民族积极地伸出援助之手也一直是我们的外交领域不变的宗旨。此外,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的崇高性还突出地表现在她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人民的利益就是她的利益,实现人民的幸福就是她最高的幸福。她因人民而存在,因为人民而有价值,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风范中最基本、最本质的部分。“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8]因此,中国共产党人最痛恨的就是背离人民、损害人民利益的蜕化变质之人,对党内腐败分子决不容情的鲜明态度正是其崇高性的明证。

6. 改造世界的实践性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辩证统一——这是其他任何理论所不能比的。科学真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二维结合,便确保了实践的可行性。伟大的精神追求产生于伟大的时代,产生于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是中国革命实践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理念形成的现实基础。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她的阶级本性决定了寻求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成功是其崇高的使命,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具有了极为重要的实践性根源。而中国共产党人成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不仅验证了其精神追求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而且又进一步培育了其高尚的精神追求。

此外,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的实践性也是与其所信仰的哲学的本性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以往的哲学学说的本质性差别主要表现为,以往的哲学学说偏向于解释世界,甚至是教导人们要通过改变自己来适应眼前的这个世界,为现存世界

辩护和精神慰藉是其主要功能,而马克思主义学说则是以科学的、革命性的态度来推动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改造。“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0]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借助于这一具有革命意义的学说实现了对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改造。

三、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的现实意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守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对于化解信仰危机,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提高党的执政水平,以及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提供基本保障、方向引领、精神动力和领导力。

1. 有利于化解“信仰失落”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精神保障

在过去的30多年里,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它的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这其中因“信仰失落”问题而导致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动力不足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信仰失落’问题在当代中国的出现,主要地不是个人缺乏扬善惩恶、追求不朽的内在动力,而是共同理想的淡漠、历史方向感的丧失。”^[11]因此,对当下而言,坚守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追求中的科学真理性和崇高性,这对于凝聚人心,寻求历史方向感,以及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导向作用。故而,习近平主席在8.19讲话中反复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力争把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也一再证明,如果我们能坚守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充分弘扬中国共产党人优秀的精神品格,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顺利发展;反之,如果我们忽略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追求,放弃了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守,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遇到问题。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守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追求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保障。

2. 有利于推进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纵深发展

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最为基本的方面,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深入发展的基本保证。就这两个方面而言,理论创新是先导,实践创新是基础。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需

要有打破常规,冲破旧势力、旧习惯的勇气,需要有百折不挠的气概,这就需要有巨大的精神力量作为支撑和引领。纵观历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革命和建设成功,除了客观条件之外,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精神力量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发展正面临各种难题和挑战,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和步骤。但创新必然会面临种种意想不到的风险和困难,精神性的鼓励与支持就显得极为重要。这种精神性的鼓励和支持既表现为在理论上对创新性工作的积极认可,也表现在实践中对其可能遭遇到的风险和困难持积极乐观的态度。而这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就来源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追求所具有的巨大力量。因此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得以推进的基础性前提和保障,在当今历史条件下要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深入发展,就必须高度重视和发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力量的引领作用。

3. 有利于进一步明确核心价值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精神动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需要强大的精神动力,这一动力源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近些年来,精神文明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受重视,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也得到了人们的普遍响应。那么,如何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包括哪些内容?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但需要强调的是,从本质上讲,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灵魂是共产主义理想,而实现共产主义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的最终目标,故而,在此意义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的具体化。因此,弘扬和强化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关键。如果中国共产党人能坚守自己的精神追求和崇高信仰,并能自觉地使马克思主义成为自身行动的指南,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就会在全社会得以有效地贯彻和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就会得到很好的落实。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尤其是执政党自身所树立的榜样更是如此。因此,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守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建构与实践,进而进一步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4. 有利于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增强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尽管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自身建设,但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党的自身建设面临着许多新课题和新考验。如,随着党执政时间的增加和党的队伍的变化,党员的素质变得参差不齐,尤其是一些地方的党组织、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在党性、党风和党纪方面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部分党员干部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再如,随着时代发展,一些党员、干部对党的先进性要求认识不足,从而导致其思想观念、能力素质不能完全适应和符合时代要求,这主要表现为部分党组织的管理手段和创新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任务不相协调等。随着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我们党所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等,都将是长期而复杂的,管党、治党的任务也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并使之在不断改进中得到加强,这是我们党目前必须面对的任务和难题^[12]。当前,要切实地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我们开展多方面的工作。这其中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坚守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因为只有精神上的坚守与肯定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的思想面貌,从而激发人的行动力量。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只有不断地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坚守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党的思想理论水平、改进党的工作作风,从而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故而,在当前条件下,要改进党的工作作风就必须从重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入手,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力领导。

事实证明,在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但凡重视党的精神建设,强调党的精神追求时,我们党的建设就会取得较好的成绩,反之,则会存在问题^[13]。在建党 90 周年庆祝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提出了目前我党执政所面临的“四大危险”,并强调指出,“要化解这些执政危机就需要加强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并强调这是把握实际,凝聚人心,开创未来的动力源。”^[14]因此,在当前条件下,坚守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增强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这对不断提升我们党的执政能力有着极为重要的实践意义。

(下转第 30 页)

- [7] 施国庆. 移民权益保障与政府责任[M]. 吉林: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0: 18-20.
- [8] 朱力. 走出社会矛盾冲突的漩涡[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117.
- [9] 迈克尔·M·塞尼. 移民、重建、发展: 世界银行移民政策与经验研究[M]. 河海大学水库移民经济研究中心, 译. 南京: 河海大学出版社, 1998: 97-105.
- [10] DOWNING T E. Avoiding, new poverty: mining-induced displacement and resettlement [M].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2002: 9.
- [11] 韩秀记. 通往成功之路: 非自愿性移民社会研究理论回顾[J]. 社会科学研究, 2012(8): 186-193.
- [12] DE W. Development Induced Displacement: Problems, Policies and People [M]. Oxford: Berghahn, 2006: 85.
- [13] DOWNING T E, GARCIA-DOWNING C. Routine and dissonant cultures: a theory about the psycho-socio-cultural disruptions of involuntary displacement and ways to mitigate them without inflicting even more damage [C]// Development and Dispossession: The Crisis of Forced Displacement and Resettlement. Santa Fe: School for Advanced Research Press, 2009: 109.
- [14] 赵宜胜. 三峡工程移民问题对社会学的呼唤[J]. 社会学研究, 1993(2): 17-22.
- [15] 苟厚平, 陈绍军. 我国经济建设中非自愿移民社会风险与控制[J]. 云南社会科学, 2001(2): 23-27.
- [16] 陈绍军, 郑宇辉. 水库移民的特点及风险分析[M]//移民与社会发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南京: 河海大学出版社, 2002: 246-247.
- [17] 周恒勇, 梁福庆, 郑根保. 三峡农村移民安置中的社会风险因果树分析[M]//移民与社会发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南京: 河海大学出版社, 2002: 249-254.
- [18] 郑瑞强. 西部水电移民群体性事件发生与防控[J]. 水利发展研究, 2010(5): 15-20.
- [19] 林苇. 法治视角下水库移民类群体性事件的思考[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2011(3): 127-132.
- [20] 韩武卫. 完善工程建设征地制度的法律思考[J]. 特区经济, 2013(3): 173-175.
- [21] 应星. “气场”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J]. 社会学研究, 2009(6): 105-121.
- [22] 陈绍军, 韩振燕, 刘立民, 等. 水库移民社会风险预警系统初探[J]. 水电能源科学, 1998(3): 21-25.
- [23] 顾茂华, 苟厚平, 范治晖, 等. 水库移民遗留问题处理: 规划·管理·探索[M]. 南京: 河海大学出版社, 2000: 195-220.
- [24] 何志扬, 徐惠洁. 水库移民城镇化安置中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J]. 水利经济, 2013, 31(5): 66-71.
- [25] 蔡萌生, 蒋力, 曹志杰. 水库移民安置不同阶段的公众参与研究[J].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15(1): 26-30.
- [26] 陈绍军, 于浩淼. 非自愿移民社会风险控制中的“域”[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2): 41-45.
- [27] 余文学. 水利工程建设引起的社会问题及对策[J].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7(4): 53-57.
- [28] 翁定军. 冲突的策略[J]. 社会, 2005(2): 112-136.
- [29] 杨雅厦. 农民应对农村社会风险的问题治理: 基于可行能力的分析视角[J].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6): 17-21.
- [30] 龙腾飞, 张峻荣, 施国庆. 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规划的交互式公众参与模式[J]. 人民长江, 2008(5): 86-88.
- [31] 王沛沛, 许佳君. 社会变迁中的水库移民融入[J].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15(3): 46-50.

+++++
(上接第 13 页)

参考文献:

- [1] 王玉发. 学习党史军史 传承红色基因 大力改进党委班子和领导干部思想作风[J]. 军事历史研究, 2012(2): 1-3.
- [2] 肖力, 邢洪儒. 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理念的形与发展[J]. 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 2010(2): 4-7.
- [3] 陈先达. 走向历史的深处[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13.
- [4] 王永贵. 马克思主义视阈中意识形态的内涵和功能阐释[J].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14(2): 1-4.
- [5]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150.
- [6] 张琦. 核心价值观与公民文化人格构建[J]. 求索, 2013(10): 113-115.
- [7]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34.
- [8] 张峰. 习近平总书记 8·19 重要讲话的八大亮点[EB/OL]. [2013-09-05].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0905/c112851-22812319.html>.
- [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2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66.
- [10]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02.
- [11] 侯惠勤. 当代中国信仰问题的出路是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J].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2011(4): 4-7.
- [12] 彭华松. 保持中国共产党纯洁性的现实思考[J]. 求索, 2013(8): 247-249.
- [13] 肖铁肩, 罗海云. 当前国内政党意识研究述评[J]. 湖湘论坛, 2013(3): 55-61.
- [14] 刘宗洪. 化解“四大危险”推进党的建设: 学习胡锦涛同志的“七一”讲话[J]. 理论探索, 2011(5): 8-11.